

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下）

李晋林

第四章 平水刻版印刷业兴盛原因新探

宋室南迁，平阳临汾逐渐代替了汴京（今河南开封）而成为黄河以北地区金朝的刻版印刷业中心，并且一直沿续到元朝。那么，为什么这里会成为金元两朝的刻书中心所在呢？考述平水刻版印刷业（尤其是金代平水本）兴盛的原因，也正是目前版本学界所想要急切解决的问题。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是清末民初叶德辉，他在《书林清话》卷四《金时平水刻书之盛》条云：“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唯平水不当要冲，故书坊时萃于此。”其次是1952年10月北京图书馆举行“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在所编目录《说明》中云平水本之兴盛，乃因金人占领北宋都城汴梁后，迁移了那里许多书肆刻书工匠到平阳，从此平阳代替汴梁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刻版印书中心。再次，1960年2月《中国版刻图录·序》云：“平阳又称平水，即今山西临汾，其地盛产纸张，质地坚韧，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金元两朝政府设有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其他诸家所述不外乎以上这三种观点。

但是，正如黄永年先生在其《古籍版本学》“金平水本”条云：“目前尚作不出圆满的解答……都只是估计，暂时还找不到坚强的证据。”这是因为，其一，叶德辉由“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

戈。唯平水不当要冲”，而得出“故书坊时萃于此”的结论，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推理不能成立。山西自古山河表里，处处雄关要塞，乃历代兵家必争之所。并州太原向为古今战略重镇，平阳临汾为金西路军进兵秦蜀南下河洛的必控之地。故平阳为宋金角逐的主要战场之一。双方在此交战历数十年之久。兹略引清毕沅《续资治通鉴》文字数条以证，卷九十六李纲谓“太原、河间、中山，国家屏蔽，号为三镇，其实十余郡地，塘泺险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国”，张确“守隆德，闻金人南下，表言河东天下根本，无河东，岂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卷九十七载，自靖康元年三月，宗瀚率金西路军破忻、代，围太原，月余不能下，“适平阳义军叛去，攻破威胜军（今屯留境内），遂引金人入（平阳）南北关。粘没喝（即粘罕）叹曰：‘关险如此，使我过之，南朝无人矣。’”这是金人初次进入平阳附郭的情况。同年七月，宋将张思正、折可求与金人战于文水、汾州，先后皆溃，“于是威胜军、隆德府、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冬十月“丙辰，金人入平阳府”。其后直至熙宗即位之天会十三年即宋绍兴五年，据《续资治通鉴》一百一十六卷载“自靖康之末，两河之民不从金者，皆于太行山保聚太原义士张横者，有众二千，来往岚、宪之间，是秋（绍兴五年秋九月）败金人于宪州，擒其首将。又有梁青者，怀、卫间人，聚众数千人，破神山县（今浮山县）。平阳府判官郑爽以大军讨之，不敢进。居数日，都统制乌玛剌引骑五百与爽会，乃併其兵与青战，兵败为青所杀。”金天眷三年即宋绍兴十年，岳武穆出师北伐，《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载“（八月）戊寅，知陕州吴玠遣统制官侯信渡河劫金人中条山寨，败之，获马二十匹。翼日又战于解州境上，败之，杀其将茂海。”据此可知平阳以南地界直至金天眷末年，尚未完全安定下来。如果说，平水不当要冲或未经战火焚炙，这与实情不符。况且自太宗天会四年，金人占领平阳，直到熙宗皇统末平水本系解州天宁寺始刻释

藏，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难道其时书坊未萃于此，何兴起之迟也？更何况平水本现存最早出版物多为大定间事，距金人入主平阳已是四十年左右了。所以，叶氏由“唯平水不当要冲”而导致出“故书坊时萃于此”的必然结果，是不符合平水本的发展历史的。退一步说，“平水不当要冲”充其量也只是“书坊时萃于此”的客观外部因素和条件之一。根据现存版刻史料及流传实物证实，对于金平水本系刻本兴起于皇统末而平水本盛于大定、明昌间和元平水本盛于蒙古时期到元中朝而衰落于元代后期的刻印历史，是过去版本学家从未考察并引起过重视的。

其二，关于平水本的兴起是因金人进入汴梁，迁移该地诸多书坊、刻书工匠来到平水，从而使当地刻版印刷业兴盛的问题。这一答案不免失之偏执，似乎山西唐宋时期自身根本没有从事刻版印刷业的历史。且这种技术纯由金人从汴梁携带工匠而来的解释，又提供不出任何可靠证据，也仅是一种猜测和估计。事实上，山西刻版印刷业也有着自身悠久的发展历史，经笔者考证所得，山西宋代刻本实物最早为宋雍熙三年绛州（今新绛）宋守真刻《佛说北斗七星经》，版式精美，字体整肃，并镌“雕印人赵寓”字样，上距唐哀帝不过七十年时间，如不是长时期行业经验积累，是绝不会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可证晋省刻版印刷历史至迟不会晚于唐末五代。此外据刻版印刷资料载尚有嘉祐五年五台山真容院刻《古清凉传》二卷、《广清凉传》三卷，治平中太原府官刻本《晋阳事迹杂记》十卷，政和间解州庞氏刻《政和新修政类备用本草》三十二卷，宣和间解州解县寇约刻《本草衍义》二十卷。时限上起北宋初雍熙，下迄北宋末宣和。刻印地域从北至南依次有五台、太原、绛州、解州，版刻种类上官刻、私刻、坊刻、佛寺刻本俱全，版刻内容史志、医籍和佛典等丰富繁杂，版刻流通区域近行于中州远至于福建莆田。此外全国版刻界先驱亦多为山西人氏，如唐河中（今永济）人、后来隐居家乡王官谷的诗人司空

图于洛阳募刻经疏，雁门人纥干泉于镇江刻《刘宏传》。五代河中龙门人（今河津）毋昭裔镂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版，其子守素赍至中朝印行于世，此为我家刻先驱。延及南宋又有曲沃人家诚之庆元年间于邛州刻《丹渊集》，隐士王氏取瑟堂刻其先祖隋代河中龙门人王通《中说》，汾阳博济堂于成都刻《十便良方》。以上这些无疑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山西刻版印刷业的发展。金代平水刻本、平水本系刻本及山西其他区域刻本，从刻印历史上看肯定是渊源有自、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的，绝非学界所持“汴工北迁”的一味外来之论。元初张存惠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首定宗四年麻革序云：“神农氏而下名本草者非一家，有所谓唐本、蜀本者。宋政和铨定诸家之说，为之图绘。行于中州者，有解人庞氏本，兵燹罕存。今平阳张存惠字魏卿，因庞氏本附以寇氏《衍义》，比旧益备。”张氏刻书，上依山西宋代本土庞氏、寇氏刻本，自然会受到版刻形式、风格、字体等工艺影响。这就是一条传承有自的铁证。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金人入汴、裹携工匠北迁对平水及山西其他地域刻版印刷业所带来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和影响。金人攻克汴梁，正值北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宋史·钦宗本记》载：“（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宋人还多次把监本书籍、印板押送金营。华人男女上自宗室后妃、下迄工匠、艺人，被驱赶北上者，达十余万人。那么这些工匠中有多少刻版印刷工人流落到平水？为什么这些工匠从金太宗天会五年前后即已北迁，一直到熙宗皇统末甚至到大定间将近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些人方重操此祖代相传之业？这又是些难以破解的疑

难困惑。学界至今尚无确凿证据可供。本人经考证只能在此提供两条证据，以证明河南外来人士对本省出版业有所贡献的事实。第一，前引金明昌三年张谦刻《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十五卷，前有大定二十四年平阳毕履道序。次为张谦自序，末署“时明昌壬子岁古戴鄙夫张谦谨启”。张氏自称祖籍为古戴，与平阳对称。考古戴为金时河南考城县别称，考城古为春秋戴国，秦置留县，后汉改曰考城。隋唐因之，五代梁改曰戴邑，后唐复曰考城。宋属京畿路开封府，金属南京路开封府睢州。明昌壬子为明昌三年，时间上距金人北迁移民的天会五年已近六十年，从序言语气上看，则张谦自称祖籍古戴，或为随金人从汴梁北迁者，亦或为北迁工匠之后裔。第二，金平水刻本中，有些书系据北宋汴梁坊本重刻，刀法版式极为相似，甚至还保留了北宋的避讳字。如今国图藏金平水坊刻《南丰曾子固先生集》，风格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临安府荣六郎家据北宋汴梁坊本重刻的《抱朴子》，如出一辙。这也从侧面证实金代平水刻本肯定会受到北宋汴梁坊本影响的事实。文化交流，相互影响，势所必然。

其三，至于说金元两代平水一地盛产纸张，质地坚韧，因而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并设有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这也不是平水本兴盛的惟一原因。一些本籍学人称说金代平阳造纸业发达，稷山竹纸和平阳麻纸，享名一时。更有甚者，口称平阳东汉中期造纸业即已十分发达，利用麻头、绳头生产的麻纸，坚韧洁白，用作公文帐簿，历久不朽，行销全国各地，庶几与蔡伦造纸比肩抗衡。其实这些论调纯系子虚乌有、无端夸大之辞，既提不出可靠史料依据，又无出土传世实物为证。更何况造纸业只是平水刻版印刷业必要的客观物质保证，但不是惟一的必备条件。

关于山西造纸，有史可稽的记录为南北朝时南齐王琰《冥祥记》所云蒲坂金经纸，唐李肇《唐国史补》所云蒲州白薄、重抄，唐玄宗时萧诚以山西野麻等制作的斑石纹纸，北宋苏易简《文房

四谱》所云北土桑皮纸。做为土产贡赋，宋《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云：“蒲州……土产：有盐铁之饶、竹扇、经纸……”可见蒲州一直是山西的造纸基地。金元有关纸、墨等的记录，《金史·地理志下》载“太原府……有造墨场、炼银洞……”、“平阳府……有书籍。”又《金史·百官志·六部所辖诸司》载“随处交钞库抄纸坊：使，从八品。贞祐二年，设于上京、西京、北京……平阳、太原……贞祐三年罢之。”平阳府“有书籍”和平阳、太原有交钞库抄纸坊，这是金元两代山西有造纸业现象的仅有记载。交钞用纸，据《金史·食货志三》载兴定元年“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难得，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这种桑皮纸“质地坚韧”，既可印制交钞，也可印书，故平水版纸张近于浙、蜀版纸张而坚韧过之。如果说平阳“其地盛产纸张，质地坚韧”的说法有所依据的话，大概证据也就仅此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因金、元史无确切记载，就一味否定这种说法。因为书籍的印制、交钞纸的抄制肯定与造纸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山西方志对本土纸张的记载稍为详切，《〔万历〕山西通志·物产》“货属”条载“蜡粗纸出省城河西”，“平阳府”条载“翼城之硃、绢，蒲坂之帕、纸，亦概省所未有也。”明确记载平阳临汾出产纸张的是《〔雍正〕山西通志·物产》“平阳府：绵纸，以麻为之，有尺样、双抄诸名，临汾、襄陵出。”《〔雍正〕临汾县志·物产》亦载“货属：纸……”《〔光绪〕山西通志·风土记》记载了山西作为方物入贡的纸张的数量，其云：“其采办之物，解交户部者有铁、绢、纸……毛头纸一百万张，呈文纸四万张……毛头纸，每张长一尺七寸，宽一尺五寸。呈文纸，长一尺九寸五分，宽二尺九寸五分。”同书《公署略》“铁绢局”条又云：“毛头纸一百万张，旧由太、汾、平、蒲四府承办……呈文纸四万纸，旧由潞、泽二府承办……”这些内容实际出自顺治刻本《山西赋役全书》和雍正刻本《山西省赋

役全书》、乾隆和光绪刻本《晋政辑要》诸书，清袭明制，但山西这种大批量贡纸最早也应在明万历之后，且这时的造纸已普及到全省约一半的区域了。

上面这三种关于平水本兴盛原因的结论，都是单纯地把平水刻版印刷业的兴起归结为某一单一原因，而不是从平水刻版印刷业本身内部因素、外部条件及社会发展历史几方面综合加以考察。所以这是根本不切合实际的，也是极不科学的。

金元时期，平阳临汾之所以能代替汴梁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主要刻版印刷中心，除上述传承本省版刻传统因素外，还有着其自身政治的、历史的和物质的条件。

首先，金人政局的逐步稳定，经济的逐渐恢复发展，行政区划的规格设置，军事地理位置的险要，使平阳最终成为金朝南部中原地带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地区之一。金人立国之初，但知以兵称雄天下，灭辽、西夏、高丽，未几而破宋朝汴京。山西自金太祖天辅六年攻占大同，太宗天会三年西路军由宗翰率军攻取太原，六年终克平阳，而后与东路军会师开封，北宋告亡。其间黄河流域惨遭宋金战乱的破坏，使北方经济受到极大摧残。《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三建炎元年所云黄河南北白骨蔽野，破瓦颓垣，“荆榛千里”，两河地区“田野三时之务，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接着一直到皇统元年“绍兴和议”签订前这十三年的时间里，金人始终以征伐为主要目的，而山西内部各地人民因不堪金人残暴统治，纷纷组织武装，抗击金军，多则数万人，少则上万人。如上党王彦的八字军，五台山区僧人洪济大师，汾水沿岸的李宗臣。平阳梁兴的忠义社皇统初曾收复山西南部 and 河南黄河以北的大片国土，给金军以沉重打击。所以，“绍兴和议”签订以后，随着宋金疆域的界定，宋金交战前线的南移，山西的情势才基本稳定下来。熙宗此后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也使社会经济、民生得以休养复苏。海陵迁都燕京，将金朝的政治

中心由女真故地迁到中原汉人居住的地方。五京之制大备，实际上标志着对汉文化的一种接受和认可，但紧接的南侵扩张，又是一种武力征伐、无遑文事的征兆，最终自取灭亡。直到大定五年金世宗与南宋势均力敌的进一步议和修好，南、北对峙局面彻底形成。世宗一系列有利于北方社会恢复和发展的措施，官制和礼仪制度的完全确立，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相对于做为金人南部边城的南京汴梁，河东南路平阳府临汾作为金人西控秦蜀、南扼河洛的要地，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一定政治、军事意义的经济大府。

其次，随着河东南路平阳府经济的繁荣，自古就是文化名区的山西南部此时随之而带来了文化的复兴，文教、礼乐之事大兴，这一现象在《中州集》、《归潜志》里均有反映，佛道两藏、韵书、诸宫调（另外如后来的元杂剧）就是这种文化复兴的结果，《金文最》及明、清山西方志中有大量兴建庙学、县学、佛寺道观的碑文，恰恰也就是在大定到泰和这一段时间内。而作为河东南路平阳府治的临汾，此时自然成为整个区域的一个文化中心。《金文最》卷七七载金大定十一年临汾人毛麾撰《康泽王庙碑》云：“（临汾）兵火荡尽四十余年，民思所以兴起而未有倡之者。”从时间上推正好是天会初，兵火之后，经数十年休养生息，至大定间方百废待兴。这也正与现平水本流传盛于大定的事实相吻合。另外章宗大定间的兴学选举，无疑对平水的刻版印刷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金史·选举一》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兴学校……上从其议。遂计州府户口，增养士之数，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间、洛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辽阳、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府各二

十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绛、定、卫、怀、沧州各三十人，莱、密、潞、汾、冀、邢、兖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余二十三节镇皆十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洛、棣、亳各十五人，余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于此平阳与其他四府并列为一等学额，山西其他地方太原、河中、绛、潞、汾、代等而次之，可见金政府对国家文化中心之一的平阳的重视程度。《金史·选举一》又云“凡词赋、经义、进士及律科、经童府试之处，大定间，大兴、大定、大同（时西京）、开封、东平、京兆凡六处。”“章宗明昌元年正月……命特添三处，上京、咸平府路则试于辽阳，河东南、北路则试于平阳，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承安四年，又增太原为十处。”平阳府临汾既为府试进士之处，当时考试的内容又不外词赋、经义、律科、策论，外加“医学十科”及“凡司天台学生……其试之制，以《宣明历》试推步，及《婚书》、《地理新书》试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课、三命五星之术。”故平水本内容除兴盛于当时的佛道（包括老庄）两教图书外，就是经书、词赋别集、韵书字类、医学地理诸书。我甚至可以贸然推断这么一个结论，今传世平水本无刊刻年月而称金中叶坊刻本者，或许都应刻于大定中叶、明昌前后。如有例外，也不会越过皇统间。

再次，温暖的气候，丰富便利的纸、墨、刻版板材及河水资源，构成了平水本兴盛原因的第三个因素。关于这一客观物质资源的记述，前已有论述。需补充的是，至今临汾贾得、县底和襄汾邓庄等乡镇，几乎村村有纸碾作坊，所产麻纸、棉纸远销至内蒙、河北一带。有清、民国间，当地人很多在北京开有纸铺出售本地纸张者。平阳年画制作也是历史悠久，清中期道光、咸丰至民国初年，晋南民间木版年画作坊极为繁荣。在临汾县城及周围乡村屯里、西卢、大堡、金殿、桑湾等农村；襄汾县在王村、襄陵镇、庄头村和汾城单家庄，以及洪洞、曲沃、侯马、新绛、稷

山、河津、闻喜等地，大小画铺作坊无数，“祥顺店”、“南同升”画店俱称盛于时，行销四方。新绛南关薛家的“盖盛成”画店（约开业于道光间），每年印刷销售年画达十万张左右。除销售本地外，还远至陕西、甘肃各地。此平阳年画皆为平水版之遗响。

最后，至于元平水本兴盛的原因，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元承金制。现今我们可以确认的金代平水最晚刻本为金哀宗正大六年（1229）所刻《平水新刊韵略》五卷，元代平水最早刻本为蒙古太宗九年（1237）至乃马真后三年平阳玄都观刻《玄都宝藏》，中间相隔不到十年时间。证之金、元二史，《金史·本纪·宣宗中》载“（兴定二年）冬十月甲辰……己酉，大元兵徇绛、潞。壬子，攻平阳，提控郭用死之。癸丑，下平阳，知府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李革及从坦死之。”“十二月……乙卯，以礼部侍郎抹撚胡鲁刺为汾阳军节度使，权元帅右监军，与岚州元帅古里甲石伦完复河东。”“（兴定五年）五月……壬寅陕西元帅完颜赛不遣使来献晋安、平阳之捷……”《金史·本纪·哀宗上》载“（正大四年）二月，蒲阿、牙吾塔复平阳，执知府李七斤，获马八千。”“三月……大元兵复下平阳。”以上《元史》也有相应记载。《〔雍正〕临汾县志》卷五《祥异·历代兵氛附》载哀宗正大四年“四月金纥石烈真袭击元招讨使权国王按察儿于洪洞，李守忠出援之，会于高粱，师溃入城。元平阳副帅夹谷常德潜献东门以纳金兵，城遂陷。执守忠至汴，守忠语恶，置铁笼中火炙死。”（按县志此节记载甚详，然不见于《金史》、《元史》，未明其出处）于此可知金人自兴定二年十月平阳首次失陷，十二月收复，到正大四年二月收复、三月失陷、四月再复。其间几经反复，正大四年四月再复之后至金国灭亡，史无记载，其详情也不复可知。《元史·本纪·太宗》载“二年……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吕振、刘子振使太原，杨简、高廷英使平阳……”是金正大七年（当太宗二年）元人已安定平阳也。金末平水书籍王文郁能于正大五年刻

《道德宝章》一卷、正大六年刻《平水新刊韵略》五卷，可见金元交战未曾给平水的手工业造成太大的影响。然后紧接着《太宗本纪》载太宗八年六月从耶律楚材之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九年秋八月，太宗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在占领金人地盘后，迅速振兴文教，也足见元太宗对汉文化的重视，不废《元史》“治平”之称。马可波罗于元世祖十二年至上都，得世祖信任，仕元十七年，其在《马可波罗行记·太原府国》描写至元间山西景况时云：“太原府工商颇盛，产葡萄酒及丝，有商人到印度通商谋利。平阳府居住商人不少。”亦可见世祖至元间平阳繁盛迹象。元平水刻本有确切年代可考者，始于蒙古太宗九年，终于元皇庆二年。平水本系刻本始于蒙古乃马真后元年，终于元泰定四年。元皇庆、泰定属元代中期，其后再无确切年代之刻本流传，这或许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泰定帝出自晋邸，其后宫廷内讧，诸王互相倾轧，危机四伏。《〔乾隆〕临汾县志·杂志》载“致和元年九月，也先帖木儿军至晋宁（即平阳），本路官皆遁。”“至顺元年，秃坚伯忽等攻晋宁州。”二是山西一地尤其平阳，大德大震之后经济、手工业元气大伤，人口顿减，泰定之后更是水旱、蝗饥、雹震之灾连年不绝，人有相食，惨不忍述，《〔光绪〕山西通志·大事记》均有详尽记载。三是元政腐败，供役繁重，蒙汉民不堪命，动荡频起。天历二年、至正九年又先后爆发农民暴动。至正十一年红巾军发动起义，十六年攻取晋宁路平陆、安邑，十七年其头领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兵晋宁。至正十八年三月，王士诚陷晋宁路，杀总管杜赛因不花。然后晋宁之绛州，沁州，冀宁路、大同路、辽州先后陷落，烽火数千里（见《元史》本纪、五行志）。红巾失败，山西复被元朝占领，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的孛罗帖木儿和察罕帖木儿两大军阀，从至正十九年至二十八年分别占据大同和太原，左右朝政，争夺权利，数以兵争晋宁、冀宁，相互用兵侵夺，山

西各地遭严重破坏。最终明洪武二年，山西归属明朝统治之下。我们可以肯定元泰定之后的平阳刻版印刷业无疑受到了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等原因的影响，从此而变得积弱不振，再也难以恢复原先的盛况。

这里我们也不排除金代皇统开雕《大藏经》和蒙古太宗九年开雕《道藏》这种大规模的刻版印刷工程对当地雕板印刷业的影响。金主佞佛，而有《金藏》。道教的全真道邱处机见重于元太祖，而使世宗在占据平阳不久，即有雕刻《道藏》之举，自然对保护、发展平水雕板印刷业无形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五章 金平水书籍与元经籍所建置考

关于金平水书籍与元经籍所建置考，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经部·小学类》著录《新刊韵略》五卷本，下录金许古序有云：“近平水书籍王文郁携《新韵》见颐庵老人曰：‘稔闻先礼部韵，或讥其严且简。今私韵岁久，又无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随方见学士大夫精加校讎，又少添注语，既详且当。不远数百里，敬求《韵》引。’仆尝披览，贵于旧本远矣，略言之。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谏致仕河间许古道真书于嵩郡隐者之中和轩。”并载清钱大昕手跋云：“……前载正大六年许道真序，知此书为平水书籍王文郁所定。卷末有墨阁记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轩王宅印’。是此书初刻于金正大己丑，重刻于元大德丙午，中和轩王宅或即文郁之后耶？”又载钱氏《再记》云：“许序称平水书籍王文郁，初不可解。顷读《金史·地理志》平阳府‘有书籍’，其倚郭平阳县有‘平水’，是平水即平阳也。史言有书籍者，盖置局设官于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经籍所于平阳，当是因金之旧。然则平水书籍者，殆文郁之官称耳。”这是关于金设平水书籍官局的最早推测，其依据一据《金史·地理志》，一据许古序“平水书籍王文郁”之称。之后王欣夫

先生《文献学讲义》“金代平阳刻书的盛况”条遂据此推断“当时的刻书所，既有官立的，也有私人的。发展到12世纪中叶，便形成了繁荣的局面，不亚于宋代的浙、蜀、闽三省。”《中国版刻图录》亦云：“平阳又称平水，即今山西临汾，其地盛产纸张，质地坚韧，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金元两朝政府设有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后人从此多持此论。

许古其人，据《金史》本传及金元好问《中州集》知其字道真，明昌五年词赋进士（按《中州集》云承安中进士，此从《金史》）。在宣宗朝以直言极谏称，历监察御史、尚书左司员外郎，右司谏兼御史。哀宗初即位，迁左司谏，未几致仕，居伊阳，郡守为起伊川亭。许氏正大七年74岁卒，上推可知其生于正隆元年。前序中自称“颐庵老人”，可知“颐庵”为其号。云“书于嵩郡隐者之中和轩”，“嵩郡隐者”当为其闲号，“中和轩”为其斋名，殆即伊川之亭也。此斋名正与王文郁平水斋名同，此或即文郁“不远数百里，敬求《韵》引”之缘由。其称“平水书籍王文郁”，“平水书籍”与“嵩郡隐者”相对，一显一隐，盖明称其官职耳。直称“王文郁”、自称“文郁”者，以其辈晚职下也。金、元人撰序多类此。钱氏对于金代平水书籍出版机构建置的推论，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

但是在我们现在所能考稽到的有关金代史料中，关于“平水书籍”机构的建置没有任何记述。这就有两个问题需要拿出来讨论：其一，“平水书籍”的建置年代。其二，“平水书籍”的管理出版方式。对于前者，我们可以根据金朝文化发展历史来进行一些初步的推测。金自太祖、太宗之世，戎马辗转，未遑文教。至熙宗改制，尊孔读经，文教始兴。海陵王天德三年初置国子监以养士，然后迁都、整顿吏治，加快了汉文化的繁荣步伐。至世宗、章宗明昌间，典章礼乐，灿然大备，刻书业也随之勃兴。平水版兴盛的历史也正如此。再考文郁生平，以其晚许古20岁计，其为

“平水书籍”官时约在 50 岁左右，时正值金室衰亡之际。故“平水书籍”之设于何时，实难确定，但即使最早也约在大定、明昌之后。对于“平水书籍”的管理模式，我们从王氏在金代所刻两种书籍倒可以窥探出一些端倪来。《楹书偶录》卷三著录王宅正大五年刻本《道德宝章》一卷，云“首尾有木记题金正大戊子平水中和轩王宅重刊”。《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著录王宅（当为文郁后裔）据正大六年刻本重刊本《新刊韵略》卷末亦有“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轩王宅印”。大德丙午虽距正大六年将八十年之后，但据许序正大六年王宅初刻《新刊韵略》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王文郁既是“平水书籍”，却同时又自己编辑图书并由自己私宅刻印。这种形式或者说管理体制，我以为恐怕和宋、元时期官办瓷器手工业的形式相仿。刻版印刷业始于唐代，而在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手工业，刻地甚多，种类繁杂，如浙本、蜀本、建本、汴梁本等，且多为民办作坊。金人入主中原之后，随着汴梁刻书业的衰落、平水刻书业的兴盛，一种类似宋、元时期瓷器业“官窑”形式的官方刻书业管理机构便应运而生。如同“官窑”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由官监制、由民烧造贡品的窑务官督理形式，窑务官一方面负责御用瓷器的烧造，另一方面的主要任务却在于“榷陶”或者称其为课民窑，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因此，金代的“平水书籍”和元代的平阳“经籍所”当均是类似的官方手工业管理机构。它们既负责平阳当地书籍刻版的印刷，为国家的文教如文化宣传和路、府、州以下学子考试制度服务，同时又负责民营刻版印刷手工业的管理和税收。这也就是王文郁这一官僚文人既可以介入这种行业自己私宅刻书赢利，又可以邀请官方同僚如许古这类人撰序以抬高自己身份及炒作书的商品价值、文化价值的原因。张秀民先生《金源监本考》证实国子监直接刻印大量书籍而未交“平水书籍”刻印（见《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平水书籍”与平阳“经籍所”只见其名，未见其所刻书，

道理就在此。对于元代平阳“经籍所”的性质，下面将仍有专门论述。

关于元代平阳“经籍所”的建置，并未见于《元史·百官志》。其出处见于《元史·太宗本纪》太宗八年“夏六月……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編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但到世祖至元初已不复存在。《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四年“二月……丁卯，改经籍所为弘文院，以马天昭知院事。”其存在时间仅三十二年（卡特在其《中国印刷术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第十章，把元太宗八年六月“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之事又同时讹误作为金太宗八年之事，而金、元两处使用同一条资料。这种误解，至今仍有不分亥亥而继续沿用者）。《元史》既说：“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編集经史”，自然是燕京负责“編集经史”，平阳专管刻印出版。然“编修所”、“弘文院”未见于元代史料，所以具体也无从知道到底编刻了多少经史书籍。那么平阳经籍所的情形如何呢？前所说梁陟、王万庆、赵著三人具体编修情况不详，大约是这一国家机构的专门负责人。但其主要职责《元史·耶律楚材传》云：“……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可见其职责为宫廷、贵胄讲解经义。倒是四库本元王恽《秋涧集》卷六十至元二十九年撰《大元故濠溪先生张君墓碣铭》透露出另外两个主经局的人来，该文云：“余官晋府者四年，得进修之士一人，曰濠溪张君……君少颖悟，不待勉励，卓然自志于学。国初戊戌岁设科取士，君以词赋中选。既而叹曰：‘士当远大自期，雕虫篆刻将何为哉。’适貽溪麻先生洎前进士兑斋曹丈来主经局，君喜且不寐……”张君即张著，字仲明，号濠溪，平阳府襄陵（今山西襄汾县襄陵镇）人。“国初戊戌岁”即太宗十年中词赋选。著有《濠溪集》十卷，《诗学渊源》二十卷。貽溪麻先生为麻革，字信之，虞乡（今山西永

济县虞乡镇）人。兑斋曹丈即曹之谦，字益甫，兑斋其号，应州（今山西应县）人。金兴定中进士。著有《兑斋文集》行世。据此可知麻、曹二人乃是太宗八年立经籍所于平阳后，于太宗十年受命来主平阳经籍，具体参与编刻之事的。曹、麻二人皆为金人而入元者，偶或从事于文教，传道授业，尚希保持不仕二朝之耿介清名，故《元史》言及儒士梁陟、王万庆、赵著之名，而不及麻、曹二人，殆未授官而实主平阳经籍所事者，故史亦无载。《〔万历〕临汾县志·人物·流寓》言曹之谦“寓居平阳三十载”，从曹之谦太宗十年来主经局，三十年后弃世，恰好到世祖至元四年，也正是平阳经籍所终结而改为弘文院之时。王恽《秋涧集》卷四十二《兑斋曹先生文集序》云：“北渡后，斯文命脉主盟而不绝者，赖遗老数公而已。夤缘蒙元、李诸公与进亲承指授，唯貽溪、兑斋未之见也。及调官平阳，私窃喜幸，虽不复瞻拜履綦，而遗文得遂观览。”考《元史》王恽本传，至元十年由监察御史出为平阳判官，其至平阳，曹氏已做古矣。至于麻革至元十二年尚撰有《游龙山记》（见《归潜志》）。

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元平水本”条云：“现存蒙古的平水本有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段子成刻《史记集解索隐》都是坊刻，还有不知是官刻抑坊刻的《尚书注疏》、《毛诗注疏》。”平阳经籍所到底是否刻过官方编修本，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尚书注疏》的刻工张一、何川、邓恩、吉一、杨三等，同时还刻过张氏晦明轩《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这一刻工流动的事实也说明平阳经籍所仅仅是这么一个由金代遗老儒士麻、曹二人主持的元代官方早期流传文化的管理调节机构，负责平水刻版印刷业的行政管理，具体的业务还是由众多的书坊及私人刻书业来自主进行。

平阳经籍所这一蒙古时期元人所置权宜机构，至元四年终止，元代主管印书的官署改为弘文院。其后，据元王士点《秘书监

志》云：“至元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太保大司农奏过事内一件，兴文署掌雕印文书，交属秘书监呵。”是至元十年之前已废弘文院而立兴文署雕印文书，又据《元史·百官志》知兴文署至治二年罢。接着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艺文监，秩从三品。天历二年置，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讎者俾兼治之。”是艺文监又取代兴文署也。同时艺文监又下设监书博士“品定书画，择朝臣之博识者为之”、艺林库“掌藏贮书籍”、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以上经籍所、兴文署之后的演进过程，仅是笔者依据史料进行的推测，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也有类似提法。至于有些学者提到至元二十七年立兴文署之说，并云见于《元史·百官志》，《元史》无此记载，其说可能出处有误。

第六章 平水本的历史地位、价值和影响

通过上面对平水刻版印刷业的产地、平水本的流传、行业概况、兴盛原因及金元两代官方出版机构设置的考述之后，再来评价平水刻版印刷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代中期之后到元代中期之前，平水成为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的刻书中心。同时金“平水书籍”和元“平阳经籍所”的设置，意味着金元两代国家对这一地区刻版印刷业兴盛的极大重视，也显示了官管民营这种管理模式的优越性。与南方浙刻、蜀刻、闽刻等相呼应，作为北方金、元两代刻版印刷业的代表——平水刻本自然在中国刻版印刷史上占据了一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地位。

第二，在刻书的规模、种类、价值上，跟其他区域相比，平水本绝不逊色，自有它独到之处可比肩相抗。金代《金藏》和蒙古时期《玄都宝藏》之刻，均为六、七千余卷之大型工程，可证其规模之宏大。金、元两代现知书坊为近30家，可见其当时之繁盛。王氏中和轩绵延百余年，又可见书业世代相传之历史。次及种类，经、史、子、集之外，兼涉释、道二藏方外之书，也是种类齐全，全面发展。论及

平水本之价值，在金、元两代平水刻本流传稀见的今天，其价值不言而喻，赵万里先生“金本相当于宋本”、“平水文化代表两个时期：金、元”之说，无疑是最确切的定论。

第三，关于平阳刻版印刷技术的质量，按照《中国版刻图录》的说法，是“字画刚劲”、“纸墨精莹，刀法遒劲”，尤其“平水书肆晦明轩主人张存惠刻印的《证类本草》和《通鉴详节》，纸墨刻工，比过去平水本精美得多，达到当时刻版印刷的最高峰。”

第四，中国刻版印刷术除去早期所雕小块佛像宣教画外，平水书坊是较早刻印民间招贴画的地方，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实肇始于此。帝俄时代考古学家在甘肃张掖古塔内发现的平阳徐氏刻印的《义勇武安王》关羽像和平阳姬氏刻印的《四美图》王昭君、班姬、赵飞燕和绿珠像，是两幅巨大的富有艺术价值的版画杰作。尤其《四美图》画中人物风姿婉丽，线条简练舒畅，刀法刚劲流利。画幅上方横批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四周为“卍”字花边，上端为双凤朝阳，下端为蔓草缠枝花纹，艺术价值极高。此为我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木板年画。其后，蒙古定宗四年平阳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王重民先生在其《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医家类》此本条下著录云：“金元两代，平水刻书之业颇盛。是书刻于金、元之交，尤为书业鼎盛时代，故字画与插图，均较他处所刻者为精。卷四《海盐》、《解盐》两图，古朴生动，远非宋本《列女传》托名顾恺之画者所能比。持较俄人科斯洛夫在黑水古城所得金刻王昭君、赵飞燕画像，虽雅秀殊观，而人物之活跃，极为相似。此题‘平阳府姜一刊’，彼题‘平阳姬家雕印’。元、明以来戏曲小说所插版画，要当以此为祖，然则版画之兴，亦当由平阳启之。”明清之后，平阳又成为全国四大年画产地之一。

第五，平水刻版印刷业对我国的文学、艺术、医学、宗教等均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金、元之交平水人王文郁、刘渊审

时度势所归并的“平水韵”风行天下，为当时诗歌、韵文的创作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董解元西厢记》并为传世诸宫调两种最古脚本的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说明了金代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兴盛于平阳一带的事实，并且为元杂剧的兴起，也奠定了基础。在原北宋天圣四年太医王惟一奉旨铸成的铜人模型被日本人劫掠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同时宋刊《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本早佚之后，平水本《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五卷本便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极其重要的珍稀文献。《金藏》、《玄都宝藏》的刻印，标志着金、元之际佛、道二教盛行的辉煌。可以说，为了祖国文化的保存、流传、发展，平水刻版印刷业功不可没。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接第 152 页）

注：

①三秦出版社，1985 年影印本。

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 8 月。

③《两小山斋杂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年 10 月。

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以下元人文集均同，各书册次如下（以文中出现先后为序）：《玩斋集》（1215），《巴西集》（1195），《宛陵群英集》（1366），《至正集》（1211），《存悔斋稿》（1199），《研北杂志》（866），《圭斋文集》（1210），《道园遗稿》（1207），《秋涧集》（1200），《文安集》（1208），《吴文正集》（1197），《养吾斋集》（1199），《陈秋岩诗集》（1202），《东维子集》（1221），《筠轩集》（1213），《五峰集》（1215），《雁门集》（1212），《云林集》（1205），《麟原文集》（1220）。

⑤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1988 年影印《道藏》第 19 册 570 页。

作者工作单位：江西九江师专中文系